

從 治學方法 看 文學批評

鄭振寰

—

電視上不時會有「學問比賽」的節目，主持人問些「尼加拉瓜的首都是什麼？」「約瑟芬死時多少歲？」之類的問題。有人答對了，

在怪叫鼓掌聲中，螢幕現出洋洋得意的勝利者，他不但獲得了一筆獎金，還表演了自己的「學問」。這種節目把記憶零星知識的工夫當作「學問」，很多人早已引為笑柄。但在某些學術圈子裏，仍有人把強記知識當為最值得炫耀的成績，好像最近一篇由香港中文大學的黃維樑執筆的論文，便力讚夏志清典故記得多，認為拋棄多些典故的文章就算「密密麻麻地充滿着學問」①，這是我不能同意的。我更不同意夏志清論文所提倡那種重背書而輕思想，以成為「行動圖書館」為貴的治學方法。夏志清有「學閥」②之稱，影響力自是不小，因此檢討一下他所標榜的治學方法，應該是具有建設性的。

本文的批評主要基於夏志清的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友聯出版社），以及三部文集：「愛情、社會、小說」、「文學的前途」、「人的文學」，均由臺北純文學出版社出版。以下引註時我以「中」、「愛」、「文」、「人」來簡稱這四部書。

二

夏志清提議：「臺北應有人創辦一家實驗小學，

一年級即背古書，讓少數開明家長把他們I·Q·特別高的子女送去讀書。」（「人」頁一九八）這所小學「一年級即背古書，小學畢業四書五經、『資治通鑑』、『史記』諸書皆已讀得爛熟，四年級即開始讀英文或拉丁文，為國家『文化復興』作準備。」（「人」頁一四一）在散文中夏志清不斷說到自己看過很多書，但他似乎不明白並不是把一本書從頭到尾每一個字都看過查過字典就算讀過了這書，即使會背也絕不等於瞭解此書。多看書是好的，我也認為很多時背記的工夫是少不了的，但這只是最初步的工夫，看過背過之後要瞭解吸收，融會貫通，才算真正讀通了一本書。值得注意的是，夏志清三數次強調要查字典記生字，但卻沒提到還有一層融會瞭解的工夫，似乎查字典記知識就是最終的治學工夫了。有人指出死讀硬記最多造成一座行動圖書館，夏志清反駁道「一座行動圖書館絕不可能一無新見地」（「人」頁二〇〇）。從前科舉時代把四書五經連同註疏都背得一字不漏的腐儒多的是，若他們每一個都絕不可能一無新見地，中國文化何至停滯了千多年？此外，若「行動圖書館」真的像圖書館般只供參考，那還有利無害，但若

誤以爲「記得」就是「通識」，「讀過」就是「瞭解」，以不知爲知，拋弄名詞來唬人，那就不只有碍學術，而且還成爲「人之患」了。

夏志清的論著搜集得很多資料，他著作的價值也在資料搜集方面。然而文學批評不是圖書館管理，光是有資料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能從資料中發掘意義，在這一層上夏志清顯得相當低拙。他的論著矛盾重重，思路不清，見解幼稚，語氣專斷，好無故賣弄資料，文學感性薄弱，政治偏見充斥，都或多或少與他所標榜的治學方法有關。夏氏爲文鬆散冗長，每每言不及義，本文限於篇幅不能一一徵引辯駁，只能揀些簡短易引的例子討論，不過這些例子所顯示的缺點，在夏氏論著裏都很普遍，隨時可以輔證。

要做好的文學批評必須具有很強的洞察力及對文學敏感，多讀書可以培養此等能力，但那是指活讀，不是死讀。夏志清自稱讀過很多詩，單杜詩就有二百首，結果是：「在美國教詩，我常對學生說，中國詩人大多數想做高官，做官不得志，牢騷滿腹，就喝酒尋樂，或者想退隱，或者想成仙。……我既不想做官，也不愛喝酒，也不想退隱，更不想成仙，古代

讀書人的幾個理想，對我來說，毫無吸引力，讀他們的詩篇，簡直很難發生同感。」（「人」頁二三一）又舉他譽爲宋詞裏最突出的傑作，周邦彥的「六醜」爲例：「我覺得薔薇謝後，明年會再開，不值得詞人這樣哀悼它。」（「人」頁二三三）這些話顯示出夏志清的文學感性非常薄弱，他甚至感不到「薔薇謝後作」不單是哀悼幾朵花兒，而是借花喻人，嘆身世飄零，感時間無情，現代人難道不會「懷客裏光陰虛擲」？現代人找不到適合的工作不會像古人一樣牢騷滿腹？酒詩常表現出打破一切束縛的情懷，退隱是對爭名逐利的厭倦，慕仙希望從日常俗務中解放出來，這些理想如今當真不再存在？死讀書的人泥於字面意義，以爲退隱就是返鄉下種田，做官就是穿掛袍紗帽，又怎能領略文學深意？

文學批評講究能指出作品獨特深刻的意義。夏志清論著提供的見解多是極尋常之見，即使極力捧頌夏氏的文章如萬字長文「文學『博』士夏志清」，舉以證明「夏氏批評，卓見處處」的實例，也不外其說「大觀園也視爲受驚少年的天堂」，其評析賈寶玉離家時說：「表面上，他離家不遠，竟然又哭又鬧，有點

小題大作；實際上，他要離開的是這個紅塵，他要斷絕六親。」①這等隨便一個中學生都寫得出的淺近空疏之見，被慎重舉爲夏氏卓見，可見其見解實在乏善可陳。

夏志清的論點多浮誇空洞之言，禁不得深思。例如他說「紅樓夢」、「源氏物語」、「往事的追憶」三大鉅著的主題都很相近，都是「人生如夢」（「愛」頁二〇），表面看來似乎是「批評家的大手筆」①，但只要再想一下，便會發現凡是故事中包含生死興衰等人事的小說，從「三國」「水滸」到「肉蒲團」到「戰爭與和平」，都可以說是「人生如夢」的主題，萬應萬靈，早已有人舉出很多例子證明過了③。不過這等空疏的大話，雖沒甚意義，但唬唬不用腦袋的人十分有效，而且也很安全，就像醫生開維他命之類的藥一樣。但文學批評要對症下藥，沒有真功夫，要開笑話真容易。例如夏志清說賈寶玉「出家做和尚，也只能算自尋寂滅，倒不如漢姆賴德胡亂殺幾個人，自己也中劍身亡，痛快得多。」（「人」頁二四〇）認爲漢姆賴德亂殺人以自尋寂滅，簡直就像聽不懂英語的人看完莎劇演出後的評語。我絕不懷疑夏志清讀

過甚至會背「漢姆賴德」，但從一個人對作品的見解中，即可見到死讀書和活讀書的分別。

三

世上很多事物並不像表面看來那樣簡單，常要經過分析思考，訴諸思想和理性，才能瞭解它們。過份注重背記會扼殺思想，這是中國傳統教育的致命傷。夏志清推崇背記之餘，對思想和理性似乎抱有很大敵意，把新文學的弱點歸咎它們：「我國學者民國以來一向注重思想，無怪在討論文學時也免不了犯幼稚的毛病。」（「愛」頁二一）「現代中國人摒棄了傳統的宗教信仰，推崇理性，所以寫出來的小說也顯得淺顯而不能抓住人生道德問題的微妙之處了。」（「中」頁十三）那麼他自己那些不注重思想和理性的文學批評是怎樣的呢？

夏志清試圖找尋現代文學比較膚淺的原因，這是一個理論性的問題，在文學批評上也很重要，就拿它來做例子吧。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序裏，他力稱中國文學「比不上發揚基督教精神的固有西方文學豐富。」（「中」頁十四）又一再強調：「現代中

國文學之膚淺，歸根究底說來，實由於其對『原罪』之說，或者闡釋罪惡的其他宗教論說，不感興趣，無意認識。」（「中」頁一三，又見頁四三三）

香港「明報」的書評已指出夏氏此說不察中國實情，強以西方文學標準套用在中國作品上^④。其實夏氏此說即使在西方也找不到支持的根據。為什麼歐洲基督教勢力全盛、原罪說影響力最深時會成為「黑暗時代」？為什麼要文藝復興理性抬頭文學才大放異彩？夏氏毫無解釋。而他在同一序言中引 G. Steiner 所舉的西方文學三大黃金時代，就與基督教和原罪說沒有關係：希臘悲劇時代先於基督教。莎士比亞的是出了名的「世俗戲劇」(Secular theater)，基本上沒有宗教意味，基督徒的詩人兼批評家艾略特(T. S. Eliot)便因此說莎劇背後的思想比不上但丁的「神曲」^⑤。托爾斯泰被教庭驅逐出教，杜思托也夫斯基小說裏最突出的人物，如「罪與罰」的主角和「卡拉馬索夫兄弟們」的伊凡都是無神論者。為什麼有深度的文學需要原罪說？夏志清有什麼實例證明？不面對這些問題，祇舉一些朋友私下沒有實在內容的捧場話（「中」頁十三），對支持他的論點是一

點幫助也沒有的。

夏志清對世界現代文學的處方，也和對中國文學的差不多：「科學愈進步，人顯得愈渺小，已往一切宗教，哲學肯定人類尊嚴的信條，一條條都不能成立。而沒有這些信條的支撐，藝術家要創造『偉大』的作品就非常困難。」（「文」頁五八）其實人類尊嚴何曾由一些在科學面前站不住腳的「信條」來肯定？偉大的文學作品又何須什麼「信條」來支撐？假如夏志清不是作無稽之談，請他把那些「信條」列出來，讓大家看到底人類尊嚴和文學作品是否需要它們。宇宙充滿了秘奧，人生充滿了困惑，這是無可置疑的。對不肯思考的人來說，信奉宗教是最容易的逃避問題方法，因為只要作一個「信仰的跳入」(leap of faith)，馬上可以把它一套粗疏的「信條」或「教條」來當作所有問題的答案。譬如「原罪」的信條說人人生來便帶罪，但只要拜耶穌便可以洗清一切罪，以致信徒們感到內心不安時只是痛哭流涕求耶穌寬恕，這等信條究竟怎樣導致深遠的文學藝術？探討人生問題的偉大文學作品都拒絕接受任何教條式的答案，向信條挑戰，面對人生困惑而不肯逃避，真正表現出

人類的尊嚴。適才所提西方文學三大黃金時代的作品，幾乎每一本都可以作為例證。如在 Sophocles 的悲劇裏，國王依迪帕斯 Oedipus 不肯聽從妻子及衆人的善意勸阻，雖然明知前王被害的真相很可能會替他自己帶來災禍，但仍堅持找出真相。莎劇的漢姆賴德受亡父靈魂之令復仇，但却不拿起劍來便胡亂殺人，而是先深深思索復仇的意義及其牽涉的人生問題。「卡拉馬索夫兄弟們」幾乎可說是圍繞着「沒有上帝，人隨便幹什麼都可以」一句話發展的。在西方是上帝死了，在中國來說是傳統破壞，禮教不再能維繫人心，然則如何分辨善惡，如何生活，就必要每一個人憑自己的價值、感情、思想來決定。文學就是從一個人辨是非定行止時的具體感受和思慮，表現出道德問題的複雜微妙。至於宗教的信條，傳統的禮教，充其量提供一些「十誡」、「忠孝節義」等十分粗疏的道德教條或大名詞而已。

夏志清既然重信條輕思想，所以即使作品表現出深微的道德問題，在他的論著裏也變成了道德教條。例如他說古希臘悲劇寫出「永遠耐人尋味的道德問題」（「中」頁十二），但他所指的「道德問題」是什麼呢？他說：「荷馬和幾位大悲劇家的着重點都是一些『忠』『孝』『節』『義』的老玩意兒。阿幾理斯（Achilles）的驕傲和義氣與關雲長相仿，琵琶洛（Penelope）的貞節也可媲美王寶釧，不同的地方

恐怕是荷馬在表達人物技巧方面較中國的通俗小說劇作家為高明罷了。」（「愛」頁五）他完全看不到史詩和悲劇表現出人生經驗的深度、闊度和複雜性，為偉大的文學作品不過是禮教的老玩意外加表達技巧，實在完全抹殺了作品的內容。

就如亨利·詹士所謂：「文藝的花朵只能在深厚的土壤上盛放」，也許近百年來中國的土壤太貧瘠了，思想學術都那麼凋零，文學又怎能例外？死背書而消化不良的許多名詞術語，就像泥土中的沙石，非但不能滋潤花樹，還會阻礙它們根部的伸展。我認為中國現代文學膚淺的原因不在注重思想和缺乏信條，而是太缺乏深厚的思想和批判的理性。標榜背書，貶斥思想和理性，只懂得拋棄自己掌握不到的大名詞，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① 黃維樞，「文學『博』士夏志清」，「書評書目」，一九八〇年三月號。

② 劉紹銘，「經典之作——夏志清著『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引言」，見「中」頁二。

③ 如夢令，「『人生如夢』與文學批評」，「南北極月刊」第九十三期，一九七八年二月。

④ 葉積奇，評「中國現代小說史」，「明報」，「書畫」，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⑤ T. S. Eliot, "Shakespeare and the Stoicism of Seneca," in "Selected Essays, 1917-1932", Harcourt, Bace and Co., New York 1932.